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香港大風出版社

No. 2024~12

2024年12月5日

父親

李子壯¹

父親逝世已經兩年了。

2005年10月11日上午，我下了火車，到中央組織部干教局申請增加中國延安幹部學院經費。事完不久，就接到母親的電話。我立即趕到協和醫院，父親已在搶救。

母親拿出了兩份文件讓我簽字。一份是關於喪失神志後不再採取進一步的搶救措施，一份是遺體捐獻給協和醫院。

第一份我立即就簽了，我知道，自住院以來，每多花學校一塊錢的醫療費，就會成為他心理上的一份負擔。

而怕把母親身體拖垮，也是他住院以來頻次越來越高的話題。

¹ 寫於2007年，未完，待續。

第二份我犹豫了。母亲流着泪，做着说明。其实我是在猜测，父亲的这个决定，其中有没有为清华和协和的合作尽最后一份心的因素？

父亲已不能回答，儿子只能签字。

父子最后见面，他目不能视，口不能言，而我只能看着生命一点一点离开他的躯体。

妈妈终于发话了，让我通知两个弟弟，然后又说，告诉梦梦吧，赶快过来看看爷爷。

父亲于1点30分走了。在送别仪式上，他双脚下那个花篮的绸带上写的就是：一路走好。母亲名字下边，是他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媳和三个孙子的名字。我是老大。

但三兄弟中间，我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最短，如果按整年算的话，不到11年。

若说政治上的共同语言，我却最多。所以，我哭得最厉害。

小时候，爸爸不太管我。因为他总是很忙。

当他管我的时候，我可能就要挨打了，而且还不许哭。道理是哭声停止后才讲的。我小时候觉得，他在我所有同学的爸爸里个子最矮，脾气最坏。

我是他的通信员。1960年我家搬到16公寓以后，他就不时的让我通知系里叔叔们到家来开会，谈话。而在星期日的晚上，必有一个时间最早也会超过10点半的会。客厅里烟雾弥漫，笼罩着我的床。我只能愤愤的在外屋候着，有时也恨恨的看着妈妈把暖水壶或水果递进去，心里想，这些大人怎么那么馋。但在父亲打我的时候，我又盼着他们来，因为父亲会立即恢复和蔼可亲的样子。

我好像也是他的展品。系里同事结婚，他和妈妈到别人家去串门时会带上我，我还记得父亲带我参加系里一次联欢会，刘耀奇说相声，把

大家的姓名编成谜语让大家猜，爸爸名字的谜面是“被窝里递纸条”。当时，我并不愿意参加这类活动，第一，要我叫人，叔叔阿姨太多，张王李赵都有，记不清，第二次见面时难免张冠李戴，准挨批。第二，总要遇到关于他的身高的提问，很没面子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的无线电系，真像一个家。

11 岁时，父亲带我去参加了两次活动，一次是去一教听大学生英语讲（表）演，我第一次看到了“南翔同志”，但英语一个词也没听懂。一次是带我去怀柔看望系里参加四清的同事，我第一次发现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，远没有电影里长得那么好。到我为人父的时候，我才理解了父亲的用心，他想让我知道什么是学无止境，什么人是天下英才，也想让儿子知道，不是北京其他地方都和清华园差不多好。第二次活动文革时大字报中提到了，说父亲以我为掩护，进行地下活动，垂死挣扎，云云。

1965 年秋季我从清华附小考上了清华附中，年龄不满 12，身高 1 米 43。暑假里，我父亲和我作了一次正式的谈话，现在只记得他讲了要知难而进。我把这个成语写到了入学后的第一篇作文里。其实，当时的我并不是感受不到父亲对我的疼爱 and 期望，而是十分惧怕达不到他的标准。他的标准就是最好第一，起码第二。

当别着清华附中的校徽走出校门时，常常会引来别人惊讶而欣羡的目光，自己也颇为自豪。而我父亲却说，你妈妈 16 岁就只身从上海来北京上师大了，你上大学时得 17 岁。

1966 年 4、5 月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我参与编辑的班报，也从《灵通报》更名为《火炬报》。五一特刊发了一篇题头为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〉的文章，还第一次用了

套色印刷。² 那时，附中的学生凭学生证可上大学图书馆看大字报，从此我记住了叶志江这个名字，因为他的“大字报”讲了彭真对歌颂毛主席的表演露出了不屑的表情，当时他正在旁边。我回来和父亲说了此事。他说，小孩子不要管（懂）大人的事。

6月2日早上，我父亲在洗手间里和我说，你在学校写大字报时注意，不要跟在别人后面瞎签名。我很奇怪，因为父亲说话的语调和过去大不相同。我问，大字报不是不准随便写吗？他说，中央现在支持北大的大字报。

他匆匆离去。我似懂非懂。

到校后，大字报已铺天盖地，给我的第一个震动是欢迎李海浪和父亲划清界限。而她是我们的辅导员。第二个震动是班上有个同学贴出了大字报，说《灵通报》和“三家村”如出一辙。

当团中央工作组进清华附中时，我已感到了不祥。但想起蒋校长讲话那天晚上，父亲回来说，明天大学已经可以半天上课了。又觉得可能涉及不到我父亲。

6月9日，工作组进清华大学，附中贴出了“特大喜讯”——蒋南翔已被党中央停职反省。我当时就蒙了。同学们都去大学看热闹，而我则连家都不敢回了。晚上，我就在操场沙坑里睡觉。以为这就能算划清界限了。但总还心存侥幸，盼父亲不在其中。

第二天，有同学悄悄告我，看见我父亲戴高帽子上台挨斗了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我母亲才把我找回家。

回家，看见客厅门上贴着四行字的大字报，文为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传信，政治上修正主义，组织上宗派主义，生活上享乐主义。贴

² 编者查百度《解放军日报》1966年4月18日社论同名，全国报刊转载。

满了一扇门。晚上没有见到父亲，他被揪斗了，我也不愿见到他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厕所洗脸，父亲出现了，我已不记得我犯了什么错，大约是把水弄得到处都是吧，他斥责我，好像还要打我，我当胸给他一拳，说：你这时候还敢打我。父亲愣住了。

从此，父亲再也没打过我。

后来母亲说我，你怎能打爸爸……

父亲跟母亲说，儿子说我是反党分子，我无话可说。

多年后，和他一起蹲过牛棚的刘小石伯伯告诉我，父亲和他说过此事，还挺自豪。觉得我有性格，长大了。

但我心理上是不愿意父亲是黑帮分子的。

不能问妈妈，因为她说父亲不是。但她又解释不了别人为什么说他是。

她是中宣部的干部，而当时毛主席“打到阎王，解放小鬼”已经妇孺皆知。——妈妈曾说她是小鬼一类，毛说要解放他们。父亲说，毛讲的是戚本禹，姚文元，不是说你们。

我去问大同学，因为他穿着军装，出身工人又好像是红卫兵。

他告诉我说，这好办，你们家挂了毛主席像了吗？我无言。突然想起父亲玻璃板底下曾经压了一幅毛头戴八角帽的油画（挂历上的？）问他，这算不算？他没回答。

你家毛主席著作多不多？

有。——这我知道，不过那是我妈的。父亲的书架上都是外文书和我看不懂的业务书，什么高等数学，真空管一类的。最近他买了一本毛语录，还是英文版。

他沉吟了一下，起码不能算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，但也不像黑帮。

暴风雨更猛烈了。红卫兵更得意了，血统论更时兴了，爸爸更见不着了。

但附中每次批斗会时，我心里都会一阵阵的发紧。批校长时想到父亲，批同学时想到自己。

黑帮的黑话越揭发越多，什么半地下活动，什么顶峰不对，高峰科学，触目惊心。我暗暗祈祷，父亲千万别讲这类话。

工作组撤了，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，评论赞道：笔力雄健，横扫千军威尚猛，文锋犀利，刺破青天锷未残。

清华附中红卫兵不断发展，“小太阳”们如日中天。

8月24日下午，八所中学的红卫兵集中到清华附中，清华大学的贺鹏飞作了简单的情况说明后，队伍便浩浩荡荡开进了清华园，撕光了大字报，拉倒了二校门。我当时在清华附中听了那慷慨激昂的动员后，很不理解：为什么贴你父亲的大字报就该撕，而贴我父亲大字报就该看？

我到了清华园，红卫兵已设了警戒线。进不了圈子，只得家转。

后来才知道，拉倒二校门后，便让黑帮们去清场搬砖。红卫兵们则施以拳脚皮带。《清华岁月》作者写到：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，他当时是系总支书记，18年后，他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……但他没写：在李传信手里重建了二校门——这个清华大学的标志。

我在大字报区看到了父亲的专题大字报，约有80张大字报纸，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是我父亲说：现在高等教育分三派，一派是苏派，一派是毛派，一派是死硬派，我就是死硬派。——父亲这个态度在他逝世后得到了证实：当校党委在三堡开会学习毛三个谈话（春节座谈会，和毛远新谈话，和王海容谈话）时，父亲最后表态，组织上服从，思想上慢慢通。其他黑话，他最多比别人讲的尖锐一点，只有这句话是他原创。

有意思的是，大字报里还牵涉到我的二三事，以证明我父亲用修正主义思想教育我。我很愤怒，喝了我们家那么多茶的人，居然把我说得那么坏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是大家被逼无奈，应付差事。

此时，对联辩论愈来愈激烈，熊刚在大礼堂念了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〈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〉的文章，完全是仿的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的口气。在此风之下，我们班在选核心组时，剥夺了我和另外两名“黑帮”子女的选举权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划不划清界限，下场其实是一样的。

这时候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。

1. 家被抄了，造反派最重要的战利品是我们哥三个积累至今的两抽屉玩具。

2. 家里陆续搬进来两家人，各占了一间屋。我家九口人挤在 31 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。

3. 我四岁的弟弟被逐出幼儿园。他和妈说：再让我去幼儿园，我就跳楼。

4. 家中两辆自行车被借（征）用。后来好像还有铺盖若干。

5. 父亲改发生活费，38 元。相当于 25 级干部减五毛。

8.18 后，大串联起，先进分子倾巢出动，我则去竈店学农。10 月，各方面都有松动，我也开了介绍信，怕红卫兵不给盖章，上面的家庭出身写的是革命干部（有问题）。父亲给了我 25 元，我就和同学上火车了。

串联的感觉真好。谁都不知道我是一个“狗崽子”。我在南京去见了大伯伯，大伯伯让我去家里，我推说忙，去不了。他到联络站来看我，要给我钱，我想起父亲的嘱咐，他们的生活负担重，不能要他们的钱，便拒绝收那 20 元钱。大伯伯发了火，说：你爸爸每月给我寄 30 元，你不收我就每月还他钱。推来阻去，我收了十元。

从大伯那里，我第一次知道爸爸的许多事情，他如何吃苦，如何以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，如何边上清华边当家教把叔叔带大、上学、并去了哈军工。我也知道了性烈如火的湖南脾气是他们家的遗传。

在上海，我第一次吃到了1毛5一份的冰淇淋，知道了有一种比冰淇淋更贵的叫紫雪糕。第一次自己不用请示，自主花钱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看到被打倒的黑帮越来越多，官都比我父亲大，而批判他们的大字报都是“盗版”，只不过把人名换了。一个月以后，在串了八个城市之后我回到了北京，浑身开始发红，脱皮。后来才知道，我在株洲得的是猩红热，只不过是医院当扁桃体炎治了。妈妈自然心痛，后怕。父亲倒有几分欣慰，因为，他从我嘴里听到了不少熟人的消息，我能开始和他讨论问题了。

即使在这个时候，父亲也还是按惯性来激励我学习。他对我说：子实（8岁）毛主席语录已经背到第四章了，你能背多少？我答：我知道第271页语录是什么，他知道吗？父亲大诧。我说，陈毅是好同志。（注：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）

此时，诸派风起云涌，思想乱成一团。造反派们发现，打死老虎是不能名扬天下，威震四海的。工作组赶走了，校领导已倒了，要在政治上变被动为主动，必须发现新黑帮，找出“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”。而像父亲这样的人，虽说在清华身兼三职（党委常委、系主任、系总支书记），官还是太小了。因此，比起红八月来，家中日子好像好过了一点。

12月和1967年的1月，全国的形势自然是一浪高过一浪。但实际上随着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人被打倒、揭发，随着过去的“小太阳”们锒铛入狱，随着昨日的功臣越来越频繁地变成祸首，大家思想上已经不再

一边倒，好听一点是活跃起来了，“反动”一点叫疑窦丛生。

清华“揪要害”战斗队的大字报提出了如何看待清华工作看待蒋南翔的问题。一石激起层层浪。我们家的客厅又开了最后一次会。不过，是大学生们来问父亲如何看这个问题。

父亲也和我讨论这个问题。我认为，蒋南翔肯定难逃黑帮命运，否则，毛不会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，表示热烈的支持。父亲说，毛的信只是对造反精神的支持，并不是对蒋和清华工作的评价。我说，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，指的是谁？父亲说，毛讲教育问题主要批评的是文科，还表扬过清华，说清华大学有校办工厂。1964年直属高校科技成果展，清华为国家干了多少事情。我说，那毛为什么不去？（见毛和毛远新谈话，当时我以为就是这个展览）

这个讨论当然不会有结果。但有一天父亲告诉我，系里的红卫兵要找我了解他的情况。

我去了，有三四个人，好像都是女性，问来问去，主要是问父亲对文革、群众运动、蒋和过去工作的态度。表情和蔼，循循善诱，比附中的女红卫兵强多了，大约是见我年纪较小，胜之不武吧。

在附中，情况也发生了变化。1月25日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头被抓。老红卫兵因“联动”问题被点名，从此一蹶不振。我们三个人被剥夺选举权一事便自动终结。接着，军训团进校了。4月3、4日，首长的两次讲话，从此中学红卫兵分成了“四三”、“四四”两派，4月14日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发生了分裂，出现了两个总部……

但两派谁都清楚，黑帮不能不斗，因为“十六条”规定的任务，第一条就是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清华井冈山召开了十万人斗争王光美的大会，彭真、陆定一、蒋南翔等陪斗。现在想起来，实在太滑稽了，天下哪有大官陪小官挨斗的道理。

但是，王光美同志毕竟是凤毛麟角，而像父亲这样的基层干部，用于斗争会则比较方便。为了捞到政治资本，两派都把他们抓来关去，从此他就不着家了。我从1967年5月到1968年12月的记忆是破碎的。因此，下面的回忆也分不太清是他说的，还是我从他的交代材料里看的。

父亲当时的政治态度是：团派的大方向是对的，但在有些问题上我同意“414”的观点。

我不解，去问父亲。他说，我赞成团派，是因为蒯大富和工作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并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赶走了工作组。大方向是正确的。而“414”在对待17年清华工作，在对待干部问题上，观点是比较正确的。

父亲就包庇右派、创造性的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、业务挂帅分数第一等问题，都认账，都做过检查交代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交代勾结苏修（1964年出访苏联、匈牙利）问题时，对当时无线电系水平的估计：

我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，了解了他们教学科研的情况，感到我们比他们并不落后多少，只要努力，可以在不长的时间超过他们。至少在工作上超过他们。只是和他们比，党内教授太少，回校后，便不顾同志们的反对，发展杨弃疾入党。

我知道，在他的心里，有两个东西是不能碰的，一个是清华的传统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有时也许到了偏执的地步。

四人帮被抓后，我们兄弟和他开玩笑，无线电系你最得意的学生不是毛远新吗，现在被抓起来了。他认真地说：他当时可是品学兼优的学生。因为父亲死得早，他没有高干子弟的毛病，朴素，勤奋，聪明，要不是转哈军工，一直在清华，也许不会……

他的学生在鲤鱼洲农场和我讲过，留系后的感觉，就是进入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。

我很幸运，我没有亲眼看到他被别人打得头破血流。

我很痛苦，我常可以听到他在斗争会上态度不好的消息。当我从大礼堂二楼看在主席台他低头陪斗时，个子显得更矮了，而我，在喊口号的时候，也得举手。

黄报青自杀后，父亲向我们保证，绝不自杀。

但他还是怕我们受连累。一天，他把我叫到屋里：让我劝母亲和他离婚。他说，你母亲现在还年轻，可以再婚。你们跟她走。

我不同意。

我母亲直到我父亲离去，还不知道有这件事。

父亲被关来关去，不告地点，母亲满清华的乱转，想找到父亲送吃的。

我们被赶到西院附 1、附 2 号。据说是煤棚改的。

后来，父亲被关进清华科学馆，但是要家属送饭。母亲只有星期天能送，平时就靠我了，饭由看守转递进去。因怕串联，不许见面。父亲听到我的声音，有时跑出来，见上一面。有次看守偷懒，我便闯了进去，看见左右楼道均用栅栏焊死，只留一个小门。比渣滓洞防卫还要严。父亲出来，我把锅递了进去。到 1968 年 4 月 23 日那天，“414”退守科学馆，父亲被暴打一顿，推出了科学馆。

自此，我对“414”没了好感：你们打败了，我爸爸就该挨打吗？

自此，我也有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别的黑帮都没挨打，独打爸爸？

多年后，我问我父亲，那些人是谁？父亲答：不认识，忘记了。

第三天，父亲又到老团那里的牛棚报到了。这次不用送饭了，但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了。

直到 1969 年 1 月，我要去延安插队了，才被允许和父亲见一面。妈妈和我去了，这是八个月以来父子第一次见面，有工宣队员作陪。

四目相视，不能不说话，但又不能说想说的话。因为当时有生离死别的感觉，所以，我后来就把他的讲话追记在笔记本上。一共六条。现转录如下：

1969 年 1 月 12 日晚上说的话：

你下乡去，我祝贺你，送你几句话。

- 1、要无掩无饰，有错误不要隐瞒，隐瞒只能扩大错误。
- 2、不要自己几个人造一个“小气候”，在里面自赏自得，互相吹捧，那样就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。
- 3、这些人下乡去，不管主观愿望如何，总会分化的，有些和贫下中农结合不了，就会分化出来，这是辩证法。
- 4、要考虑大多数，一个是本单位的大多数，一个是全世界的大多数，不要看眼前一点点，要看到全世界，你那点只是沧海一粟。
- 5、不要看很多书，这里说是不仔细地、慌乱地看许多书，好像博览群书，其实草包一个，好像什么都懂，其实什么都不会。
- 6、不要眼高手低，好高骛远，干部子弟很多都具有这种缺点，华而不实，语言巨人，行动矮子。

这第四条他还以自己为例，说过去系里的工作，系里大多数人是拥护的。说水平高，有创造，自己也很得意。结果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。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中国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。

可见，这时他还在努力地检讨自己。还在希望我成长，成才。

工宣队员在最后做了指示，我一出门就忘记了。

我终于达到了他的要求，像这种方式的谈话在清华肯定第一，在中国也许第二。

1月13日，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，在刚满15岁的年龄去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。我在比我母亲还小的时候参加了工作，也算部分达到了父亲的要求。

这就是我和父亲只在一起生活了11个整年的原因。我在半岁到两岁半之间，曾去上海外婆家过了一段，而1966年6月以后，实在算不清他有几天在家。姑且打个对折，算是两年吧。

在以后的38年中，就没有和父亲待过半年以上，最长四个月，累积起来，大约有三年的时间。但他一直在注视着我，关心着我。

我也在关心着他。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。

我在1969年冬季回家时，开始自学平面几何，父亲很高兴，但当我把法国阿达玛编的几何学给他看的时候，他一边告诉我怎样理解“两个体的接触部分叫做面”，一边告诉我，这是培养数学家的书，你还是从初中教材开始吧。

1970年冬天，我去江西鲤鱼洲农场看他，他让我去和张二力去学打铁，做插秧机，并参加连里劳动。在那里32天，我出了30天的工。叔叔阿姨们挽留我，“就在这里干吧，这里可以吃饱。”

我不愿意。我怕在党员开会时看父亲的眼睛。那时，他身份不明的‘非’着。而过去，是他召开党的会议。

爸爸问我感受，我说，这里和妈妈（干校）那里不一样，垒个猪圈也搞设计图，看看如何科学合理，插秧机图纸拿来，第一感觉就是我要把它改得更好。妈妈那里只有马恩列斯，不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。父亲很高兴：清华本来就是不一样。现在想起来，父亲在还愿，1965年时他就和我说过，再大一点，让我暑期到清华校办工厂学工，解决动手能力问题。

一家分了四地，信件来往必多，有一次我写顺笔了，在给他的信中

署名是“友子壮”。他复信中说，能当你的朋友也很高兴，但是，你也太粗心了。

1972年，我在农村当了一年的民办教师，复式班，四、五年级。他写信告我：人们常说，教学是一门艺术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认为教学是两个理解，一是对教材的理解，一是对教学对象的理解，只有理解对了，才能教好书。我先后在小中（专）大学当过教师，后两项是在部队院校。立过三等功，当过总参院校的先进教员，均为父亲这段话所赐。

1972年12月20日，我从延川入伍，到5344部队当兵。驻地在蒲城苏坊。在部队，插队时的基础使我得到了较快的进步。论吃苦，我不逊于全连任何一个（农村）兵；论干活，抬1200斤的水泥预制板，全连只有我一天没歇没换；论武，观（察所）通（信）炮都可以，当过团教导队的军事教员；论文，一年在报纸上发十篇以上的稿子。不搞“干部子弟小集团”，当兵三年，立了两次三等功。1976年2月被任命为五连（加农炮）指挥排排长。4月因母亲手术请假回家探亲。

父亲的六条，我当时认为做到了五条。